

白云 著

中国古代史学
批评史论纲



人 人 大 版 社

白云著

中国古代史学 批评史论纲



人 天 文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贺 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白云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01 - 008838 - 9

I. ①中… II. ①白… III. ①史学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092.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1880 号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ZHONGGUO GUDAI SHIXUE PIPINGSHI LUNGANG

白云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43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08838 - 9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引言

史学批评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出现的，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自我反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为史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而史学批评产生后，又成为史学内部推动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产生甚早，早在先秦时期，史学批评意识就开始滋生了。孔子在史学功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我国古代早期的史学批评观点；孟子于“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中，意蕴了其史学批评的基本认识；《荀子》大量引用历代史实或史书中的言论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流露出了一些史学批评方面的意识；《左传》不仅对孔子修订的《春秋》一书发表了独到的评论，而且叙事与论史相结合，或以“君子曰”等直接发论，或借用前人或伪托前人发论，或借当事人或有影响的人物的话发论，在史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

两汉时期，伴随纪传体的创立和规范，编年体的发展和成熟，史学地位大为提高，史学批评的发展也进入了有自觉意识的阶段，突出代表是司马迁父子、班固父子、刘向父子等的史学批评实践。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系统总结了先秦学术思想，奠定了后世学术评论和分类的基础，体现了司马谈总结先秦学术的一种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及其以“太史公曰”形式展开的广泛而系统的评论，更见史学批评的强烈自觉意识，在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刘向、刘歆父子通过校书而成《别录》、《七略》，对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学术思想流派和文化典籍源流进行了总结和评论，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功用；班彪《前史略论》“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对以前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论，尤其着重评论了《史记》，是一篇重要的史学批评文献。班固继承了父亲的思想，立《司



马迁传》而进行的集中评论和以“赞曰”作引词的品评，严整缜密、典雅高华。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多途发展的繁荣局势，提供了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源，促进了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和渐趋成熟，史学批评的专篇、专著出现了，谯周的《古史考》、刘宝的《汉书驳议》、徐众的《三国志评》，是分别对《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进行评论的专著；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更是一篇带有理论色彩的史学批评专文。这一时期史学批评内容趋于系统化，史学批评基本范畴逐步形成，是非据《春秋》、简要宗《左传》、实录崇《史记》、周瞻重《汉书》这四大批评标尺已经逐步确立，从而奠定了隋唐以后史学批评飞速发展的坚实基础。

隋唐宋元时期，我国古代史学达于鼎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由此也走上了繁荣之路。《隋书·经籍志》对唐代以前学术文化进行了详尽总结；刘知幾《史通》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批评专著，对初唐以前史学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总结和批评，涉及史学的方方面面，蕴涵着丰富的史学批评思想；吴缜关于“事实”、“褒贬”、“文采”的辩证认识，以及郑樵的“会通”之说、叶适的“史法”之辩、朱熹的“读史”之论、马端临的“时有古今，述有体要”之议等等，都在史学批评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重要理论成果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更加明确。

明清之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史学上出现了总结和反思的趋势，学者们开始对前代史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研究和总结，使这一时期的史学批评承延隋唐宋元时期的繁荣趋势而继续发展，对古往史学有着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系统总结。王世贞关于国史、家史、野史的辩证认识，李贽“是非无定”的批评态度，胡应麟的“公心”、“直笔”二善说，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经世致用”论，钱大昕“师古之是”的批评态度和“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赵翼对比较批评方法运用的高度自觉，章学诚《文史通义》从理论上全面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之杰出贡献，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体现出的四库馆臣的史学批评思想和方法等等，史学批评成果可谓精彩纷呈，使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表现出了显著的批判总结之特性。

近代以来，伴随着进化论史观、实证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入及其唯物史观的广泛运用，史学批评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

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学批评遗产，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发掘和积极总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果，认真加以借鉴和汲取，“用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来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①对于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健康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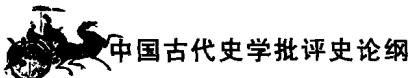
①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3页。

展是有裨益的。这便是本书撰写的初衷。

除此之外，本书的撰写还缘于两点重要的因素：

其一，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著作。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一书，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创性著作，对古代史学批评的诸多重要问题都有精辟阐述。瞿著采取难度更大的提出问题的方式来撰写，偏重于“论”，重点探讨了18个重要问题，而“在表述方法上，尽可能注意每一问题自身的历史发展，即在‘论’的形式中包含一定的‘史’的形式”（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后记》），其中，“一个有待辛勤耕耘的园地——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和理论”一目及“导论”中已论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史”，所论精辟，但十分简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遗产丰富而厚重，是需要从“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探索和作出理论总结的，应该有一部甚至多部著作来专门阐发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历史及其成就。

其二，横向比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著述层出不穷、丰富多样又各具特色，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至今尚缺乏一部自己的专史，这与中国古代史学之发达和古代史学批评遗产之丰富极不相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文学批评长期交融互补，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尤其先秦、秦汉更是如此。即便后来的文学批评名著《文心雕龙》，其于史学批评也贡献尤多，其中的《史传》篇，便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文。而《文心雕龙》本身，从结构到内容甚至思想，都深深影响史学批评名著《史通》的撰写。反之，作为史学批评名著的《史通》，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其特殊的地位。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更是兼论文史，于史学批评和文学批评都有突出贡献。然而，时至今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早已如雨后春笋，欣欣向荣。仅笔者所见，重要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就有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刘大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史》（三联书店，1986年）、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八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995年）、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张少康等《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华书局，2005年）等，甚至还有一大批拓深拓展性的著述，如赖力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荣翼《文学批评学论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复旦大学出



出版社,2007年)等,皆是富于特色的文学批评著作。相比而言,中国史学批评史著作是多么的落寞。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不揣浅陋,开始申报史学批评方面的研究课题,先后完成了学校重点课题“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省教育厅课题“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并选编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文选》等,希望能做一点拾遗补缺的工作。本书正是在这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名为“论纲”,实则已长达40万言,一则因自己删繁就简之功的欠缺;二则希望尽可能详尽地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一系统总结。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以古代史学批评为研究对象,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作系统的历史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关于古代史学批评的批评。故全书以“史”为纲,以“史学批评”为目,同时兼及“论”,旨在通过对古代史学批评史料的调查、梳理、分析、归纳,从纵向上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于横向剖析史学批评家、史学家、史学批评著作的史学批评成就及重要地位。全书分为上、下编,上编侧重于“论”,下编偏重于“史”。上编论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批评形式、批评方法、批评对象、基本范畴、重要标尺和基本功用等重要问题;下编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发展之历史及各阶段的发展趋势、主要成就及其重要价值。上、下编合观,则“论”与“史”相兼,纵与横交错,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力求系统把握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历史发展、基本成就和基本特点,挖掘其理论内涵,总结其固有特色,故名曰《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目 录

引 言 / 1

绪 论 / 1

| | |
|--------------------------|----|
| 一、史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 | 1 |
| 二、“史评”类目的设立和史评体的发展 | 4 |
| 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现状分析 | 8 |
| 四、本书的内容和结构 | 17 |

上 编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轨迹 / 20

| | |
|----------------------------|----|
| 一、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萌芽：先秦 | 20 |
| 二、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确立：两汉 | 23 |
| 三、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渐趋成熟：魏晋南北朝 | 26 |
| 四、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繁荣：隋唐宋元明清 | 29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形式 / 34

| | |
|--------------|----|
| 一、散 论 | 34 |
| 二、序跋 | 35 |
| 三、传 赞 | 36 |
| 四、专 文 | 39 |
| 五、专 著 | 39 |
| 六、章 表 | 41 |
| 七、书 札 | 42 |
| 八、史 注 | 43 |
| 九、目录题解 | 44 |



第三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 / 46

| | |
|--------------|----|
| 一、比较评论 | 46 |
| 二、区分类聚 | 48 |
| 三、原始察终 | 49 |
| 四、求名责实 | 50 |
| 五、知人论世 | 51 |
| 六、知势论人 | 52 |
| 七、因事立论 | 53 |

第四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对象 / 55

| | |
|-----------------|----|
| 一、评论史家 | 55 |
| 二、评论史著 | 57 |
| 三、评论史事和人物 | 59 |
| 四、阐明史学功用 | 60 |

第五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 / 62

| | |
|-----------------|----|
| 一、文与质 | 62 |
| 二、文与史 | 64 |
| 三、直与曲 | 67 |
| 四、创与循 | 71 |
| 五、名与实 | 74 |
| 六、简与繁 | 77 |
| 七、通代与断代 | 78 |
| 八、史法与史意 | 82 |
| 九、德、才、学、识 | 89 |

第六章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尺 / 95

| | |
|-----------------|----|
| 一、是非据《春秋》 | 95 |
|-----------------|----|

| | |
|-----------------|-----|
| 二、简要宗《左传》 | 97 |
| 三、实录崇《史记》 | 99 |
| 四、周瞻重《汉书》 | 100 |

第七章 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 / 102

| | |
|------------------------|-----|
| 一、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 102 |
| 二、史学批评与史学规范构建 | 105 |
| 三、史学批评与学风建设 | 106 |

下 编

第八章 先秦史学批评 / 112

| | |
|---------------------|-----|
| 一、孔子的史学批评 | 112 |
| 二、孟子的史学批评 | 122 |
| 三、荀子的史学批评 | 129 |
| 四、《左传》的史学批评特色 | 138 |

第九章 两汉史学批评 / 147

| | |
|---------------------|-----|
| 一、司马迁父子的史学批评 | 147 |
| 二、刘向刘歆父子的史学批评 | 169 |
| 三、班固父子的史学批评 | 179 |
| 四、荀悦的史学批评 | 187 |

第十章 魏晋南北朝史学批评 / 196

| | |
|-----------------|-----|
| 一、范晔的史学批评 | 196 |
| 二、刘勰的史学批评 | 204 |



| | |
|------------------|-----|
| 三、裴松之的史学批评 | 212 |
|------------------|-----|

第十一章 隋唐宋元史学批评 / 221

| | |
|------------------------|-----|
| 一、《隋书·经籍志》的史学批评 | 221 |
| 二、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思想 | 227 |
| 三、吴缜的史学批评 | 247 |
| 四、曾巩的史学批评 | 250 |
| 五、郑樵的史学批评 | 255 |
| 六、叶适的“史法论”及其史学批评 | 267 |
| 七、朱熹的史学批评 | 273 |
| 八、马端临的史学批评 | 287 |

第十二章 明清史学批评 / 297

| | |
|-------------------------|-----|
| 一、王世贞的史学批评 | 297 |
| 二、李贽的史学批评 | 307 |
| 三、胡应麟的史学批评 | 314 |
| 四、顾炎武的史学批评 | 320 |
| 五、王夫之的史学批评 | 330 |
| 六、钱大昕的史学批评 | 335 |
| 七、赵翼的史学批评 | 345 |
| 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史学批评 | 356 |
| 九、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思想 | 371 |

主要参考和引用论著 / 402

后记 / 409

绪 论

一、史学批评的性质和作用

史学批评，通常也被称为史学评论。关于史学批评的性质，史学界曾有过多种界定。瞿林东先生认为：“从史学的社会目的来看，史学评论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纽带之一。”“从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中的一种高级形式的信息。”^①从史学批评和史学工作者关系的角度看，“史学评论是史学工作者自我意识的表现”；“史学评论不是小摆设和点缀品，是严肃的事业”，是“史学工作的‘主业’”。^②“从历史的发展观点来看，史学家和史学批评，绝不只是史学本身的问题，它折射出社会对于史学的评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所处位置的重要。”^③即史学家所做的史学批评工作，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事，而是表征着社会对于史学的看法，也表征着历史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将史学批评上升到关系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到了史学批评的社会意义。瞿林东先生对史学批评的性质作出了最为全面的界定。吴泽先生认为：“史学评论是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利益的需要，按照一定的史学理论和评论标准，对史学作品、史学现象进行分析和评价，是对史学规律的探索和认

^① 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242页。

^② 瞿林东：《史学评论和史学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安徽史学》1987年第4期。

^③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6页。



识。”^① 邓鸿光先生认为：“史学批评即是对史学成果作出判断与鉴别”，“作为一种特殊的史学实践活动，史学批评不仅要对史学成果的价值、意义、得失进行分析与判断，而考察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的认识活动过程，即史学家的史学思维则更为重要的”。^② 李振宏先生认为：“从史学评论的性质上说，它是对史学现象的一个理性思考，是对史学研究成果和史学研究状况的一种理性反思”，“该归入史学理论的范畴，成为史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学科”。^③ 李清凌先生认为：“史学评论是史学家对其自身史学研究及其结果史学著作的反思。它的意义，就在于史家通过对史学研究著作的分析研究，指陈批陋，披沙拣金，探索历史研究的正确途径和规律。”“史学研究包括内向性和外向性两个方面。外向性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内向性研究的对象则是史学本身……史学评论作为史学理论的一部分，它是史学内向性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史学家族中的一个成员。”^④ 罗凤礼先生认为：史学评论“就是史学的自我审视和反思，诸如书评和对于某个史学领域或专题研究状况的总结分析等等都属于她的范围”。^⑤ 游翔先生认为：“史学批评就是人们对史学实践所进行的评判”，而“史学实践”既包括史学实践主体（史家）又包括史学实践物化成果（史著）。^⑥ 王建辉先生认为：“史学评论是对于过去形态尤其是进行态的史学诸实践活动的阐释评价”，“史学批评的客观对象是历史时间和现在时间的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举凡一切有关史学的物质和精神的存在都在其注目的范围之内”。^⑦ 周一平先生认为：“对史学研究整个运动过程中各个阶段、各个部分、各个层次的认识评论，都是史学批评。史学批评的任务是总结史学研究的经验教训，探讨史学研究的规律和方法，指明史学研究的方向”。^⑧

综合上述所论，笔者以为：史学批评是一门反思的学科，是对历史学本身的分析、总结与评论，只有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可能产生。换言之，史学批评是史学的自我审视和总结，是对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反思和认

①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9页。

② 邓鸿光：《对史学批评性质和作用的再思考》，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第一辑），崇文书局，2002年版，第6页。

③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3页。

④ 李清凌：《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版），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62页。

⑤ 罗凤礼：《关于史学评论及其他》，《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⑥ 游翔：《史学批评若干基本问题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⑦ 王建辉：《史学批评与史学史》，《光明日报》1989年3月8日；《史学批评原理片论》，《安徽史学》1991年第3期。

⑧ 周一平：《司马迁史学批评及其理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识。包括对史学现象与史学思潮、史家与史著、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以及史学批评本身的反思和审视。同时,史学批评又是史学理论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史学批评的发展推动着史学理论的发展。^①

由于史学批评是对各种史学实践活动及其理论形态的理论把握和评价,要求批评者既要对被评对象进行深入地研究,又要客观地、冷静地利用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评判,力求概括出客观、公允的规律性认识。从这一意义上讲,史学批评是具有科学性的。当然,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必然有着十分鲜明的倾向性。而史学批评在对史学的分析与评论过程中也会受到一定阶级的政治、道德和美学等观念的影响。所以,史学批评也必然有鲜明的倾向性。这是史学批评研究中不容忽视的。

关于史学批评的作用,瞿林东先生认为:“史学批评对史学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史学的进步与发展,或隐或显,总伴随着史学批评。而史学批评的活力,既来自社会的启动,也来自史学自身发展的要求的激发。反过来看,史学批评对社会发展与史学发展又会产生作用和影响。”^②这是从史学批评与史学及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瞿先生还从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关系的角度指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是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③吴泽先生主要从史学批评与史学自身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史学评论的作用,认为史学批评“对历史研究和史学编纂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对一定的史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催化推进作用”。要而言之,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④李振宏认为:“史学评论是推动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有力杠杆,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时,它还有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担负着传播历史科学成果,普及历史知识的重大使命。”^⑤在《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修订版中,李振宏先生进一步阐述说:史学评论“对历史学的发展,起着调节、规范、引导的作用,是史学发展的杠杆和调节器”,它主要通过三个方面的工作来“实现其总结史学研究经验、矫正史学发展方向、传播史学研究成果的科学功能”,一是对具体史学研究成果的价值、意义、得失及其原因,进行科学的考察和评价;二是对史学研究状况的分析与评述;三是对史家

^① 详见拙文《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

^② 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335页。

^③ 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270—271页。

^④ 吴泽主编:《史学概论》,第322—332页。

^⑤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第72页。



个人史学成就、史学方法、史学思想的分析与评述。^①李清凌先生认为：史学评论的作用是广泛而明显的，一则能够帮助提高史学家治史的能力；二则可以沟通人们社会实践与史学之间的联系；三则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②张晓校先生则认为：“史学评论对于史学至少有指导作用和批评作用。也就是说，史学评论肩负着对史学发展的导向评论、正确引导、匡正谬误、批评不良，使史学能够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发展的使命。”^③周祥森先生认为：“史学批评是历史学进行学术争鸣和实现学术民主的最有效途径。史学批评是史学发展的兴奋剂或激素。新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史学批评与其同步发展。在新的世纪里，史学批评如果得不到较大的发展，整个历史学的发展也将成为一句漂亮的空话。”^④

总体上看，史学批评作为史学的自我反思、审视和总结，对史学发展具有调整、规范、引导的重要作用，是史学发展的内部动力。积极开展正常而真诚的史学批评，有利于推动史学发展、构建史学规范和建立良好的学风，从而引导史学健康发展。学术繁荣的基础在于研究，而研究的深入却赖于批评，没有真诚的学术争鸣和批评，就难以带来学术繁荣的春天。^⑤

二、“史评”类目的设立和史评体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史评体文献集中反映了史学批评的成果，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需要首先关注史评体文献。

史评体，是研究和评论史书、史事与史学的史书体，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史评体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史学研究深入发展和研究水平提高的重要表现与直接后果。换言之，史评体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没有史学的存在和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史学评论，不可能有史评体的产生。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产生于先秦时期，是在秦汉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但直至两汉，史学仍附于经学之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才摆脱了

^① 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修订本），第443页。

^② 李清凌：《史学理论与方法》（修订版），第262—267页。

^③ 张晓校：《史学评论：史学研究中不应有的薄弱环节》，《北方论丛》1998年第2期。

^④ 周祥森：《史学评论：21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学术批评网2002年1月13日。

^⑤ 参见拙文《史学批评与史学发展》，《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

经学的附庸地位，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后赵君主石勒设“史学祭酒”，“史学”一词才正式产生。唐修《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并将史部分为十三类。^①此后，史部分类渐臻完备。

在史部分类中，“史评”类目的正式设立始于宋代。唐代吴兢在《西斋书目》中初创“文史”类，兼收文论和史论之书，属集部。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昭明文选》中专立“史论”一目，收入九篇史论，至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鉴于宋代史论大兴，“故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②才在史籍分类中创列“史评”一类，树立了史学评论的规模，将司马贞《史记索引》、刘知幾《史通》一类史籍悉归史评类。“史评”类目即由此而发，此后，史家多在史部特设史评类，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朱睦稷《万卷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祁承燾《澹生堂藏书谱》、清代修《四库全书总目》、《清史稿·艺文志》、张之洞《书目答问》、梁启超《新史学》等均列了“史评”类目。另外，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明代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清代王闐远的《孝兹堂书目》、卢文弨的《补宋史艺文志》和《补辽金元史艺文志》中的“史学类”；明代陈第的《世善堂书目》、清代汪宪的《振绮堂书目》、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中的“史论类”，以及宋代王应麟的《玉海·艺文》中的“论史类”等，也都属于史评。《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直斋书录解题》中的集部“文史类”也兼收史评著作。

“史评”类目虽在宋代才正式设立，但史评的源头和历史却相当久远。早在先秦时期，史评就已经开始萌芽，孔子《春秋》中的一字褒贬书法，其实就是一种史评形式。只是那时的史评尚处于低级阶段，一般散见于史书中的某些篇章之中，往往是只言片语，就事论事；或者融合在记事之中，不够明确。但已经开始滋生出史评意识。《左传》评论《春秋》则用了比较明确的形式“君子曰”来对史实或史籍发表议论和看法。如《左传·成公十四年》载：“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孟子》则从事、文、义等范畴把握《春秋》，常常是政论中带有史论。但《左传》“君子曰”尚缺乏系统性，就事论事性质明显；而《孟子》于政论中附有史论，亦不具备独立性。二者都不是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提出评论的，也不具有调整史学发展的明确目的，所以还不是自觉意识下的史学评论。这个时期还只是史评体的萌芽时期。

两汉时期，我国史评体的发展已初具规模。汉初，汉高祖刘邦为了总结历

^① 详见本书第十一章中的“《隋书·经籍志》的史学批评”。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二十七。



史经验，曾命陆贾论秦之所以亡，汉之所以兴，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二十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① 贾谊著名的《过秦论》，从历史事实出发，针对一个朝代的兴亡，纵论秦的成败，为汉王朝提供统治的经验教训。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对先秦诸子作了总结性评论，已初见史评的自觉意识。司马迁在《史记》中仿《左传》“君子曰”而作“太史公曰”发表评论，内容自成体系，体例严谨周密，深具笔法义例，首创论赞体史评，为后世史家竞相仿效，成为后世史学评论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东汉班彪的《史记后论》“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班彪的《王命论》和延笃的《战国策论》讨论朝代兴亡、史事得失和人物事件，都是很有名的史事评论。可见，两汉时期，史学评论已经具有较完整的系统，史评体规模已经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评体在两汉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我国史学摆脱了附庸于经学的地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史评领域开始涌现出各种类型的专文、专著。如晋人何琦的《论三国志》、徐众的《三国志评》、王涛的《三国志序评》，刘宝的《汉书驳议》等，都是对具体史书的剖析评论。宋人刘祥的《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南朝昭明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设立了“史论”一目，收入史论九篇，分别收录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后汉书》二十八将论、《宦者列传》论、《逸民列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这是使史评走向专门化的一种尝试。特别是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综论孔子至晋朝历代史著的源流、得失、体例、内容和编纂方法等，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篇较系统的史学理论论文，成为我国史评体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唐代以后，我国史评体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史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出现了官修史书制度化、修史程式化的格局，使越来越多的史家、学者把史学兴趣转移到对传统史学的总结和反思之上，推动了史评的发展和繁荣，史学的取鉴、资治作用日益为封建统治者所认识，总结过去历代史学成果，成为时代的需要，刘知幾的《史通》应运而生了。《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成就包括史学方法、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家修养、史学源流、修史常识、史料范围和史料鉴定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总结和评论，几乎包容了历史学的全部问题。^② 《史通》的问世，是我国古代史评体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宋代史评又有了新发展，重要著作有范祖禹的《唐

① 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② 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